

生存哲学:论林语堂对道家哲学的现代转化

雷文学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摘要:林语堂向西方宣传道家文化并非以阐发老庄哲学的要义、宣传民族文化为最终目的,而是利用道家哲学中的某些因素,意图解决现代西方世界的生存困境,生存而不是学理是林语堂关注的中心,林语堂笔下的老庄思想是一种幽默、平和、和谐的“生存哲学”。林语堂尝试用老庄哲学解决现代世界由发展竞争及战争所带来的种种生存困境,使老庄哲学在现代背景下放出迷人的光彩。

关键词:林语堂;道家;生存哲学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2-0035-04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改变其早期尤其是“语丝”时期的战斗姿态,由“文艺必谈政治”转变到“超政治”、“近人生”,建立幽默、闲适、性灵的文艺观,他通过办刊物、写小品文、创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文化著作以及《京华烟云》、《赖伯英》等文化小说,大力宣传道家文化。细致研究后,可发现,林语堂的这种宣传并非以阐发老庄哲学的要义、宣传民族文化为最终目的,他是利用道家哲学中的某些因素,意图解决现代西方世界在生存当中的困境。也就是说,生存而不是学理是林语堂关注的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林语堂笔下的老庄思想是一种“生存哲学”。

一、道家的信徒

林语堂走向道家文化不是偶然的。像一般倾向道家思想的作家一样,他对自然的爱好很早就表现出来,他在自传里写到:“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1]50}童年时期,“山景”对他的影响是首要的,可见其性情。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八岁时写的一首诗:“人自高/终必败//持战甲/靠弓矢//而不知/他人强//他人力/千百倍//”^{[1]58}其中已经有了老子“不争”思想的信息。这些早年的几乎本能的思想性情影响了林语堂,他在中年思想转向道家是不足为怪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林语堂遭遇一系列的打击。先是1925年女师大学潮事件,林语堂因攻击军阀政府的文章受到通缉,后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

主任,不久被排挤出;1927年春,林语堂受武汉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邀请,出任外交部英文秘书,但“几个月的‘衙门’工作,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投机分子。前一刻称兄道弟,后一刻大棒相加,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向政敌摇尾乞怜,可以出卖盟友、亲人。”^[2]林语堂又来到上海写作,并与鲁迅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他的思想已流露消极情绪。特别是1933年,同盟社成员杨杏佛被“蓝衣社”特务暗杀后,本来就进退维艰、还在歧路观望的林语堂,发出了“近来更觉得与其钻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之句。”^[3]由“清议”而“清谈”,表明他要结束自己如汉朝太学士一样议论政治的习惯,转而学习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魏晋人谈玄论道、远离政治。1932年,林语堂办《论语》,之后又办《人间世》、《宇宙风》,倡导“幽默”、“闲适”、“性灵”,并创作大量闲适小品文,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向老庄思想靠近。

但此时的林语堂还不能称为道家的信徒,他并没有很多直接的老庄思想宣传,主要目的只是取道晚明公安、竟陵以及清人金圣叹、李渔等人注重性灵的思想,开创一种注重性灵的闲适、幽默文风。他真正全面推介包括老庄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在他去美国以后,陆续用英文写出《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等文化著作。他在介绍自己写这些著作的初衷时说:“除

收稿日期:2012-1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W143)

作者简介:雷文学(1970—),男,湖北广水人,博士,副教授,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了将中国人观念中的人类最高文化理想表现出来之外,除了将中国人理想中的听天由命的、逍遥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现出来之外,我还有什么更便当的取胜良策呢?”^{[4]69}“放浪者”、“流浪者”、“漂泊者”是林语堂在他的著作中屡屡称道的道家信徒,可见这些著作是以道家思想为中心的。

除了直接的介绍,林语堂还用艺术的形式,创作了《京华烟云》、《赖伯英》、《红牡丹》、《朱门》等小说,这些小说因为含有明显的文化意味而被称为“文化小说”,道家思想是其中的重头戏,这在《京华烟云》这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小说中表现得分外明显。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介绍这部小说的主要特点时说:“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全书受庄子的影响……”^{[5]797}道家思想在全书结构和人物形象上很清楚地体现出来。全书共分三卷,每一卷都以庄子的话为 topic,表明文旨。

小说塑造了两个典型的道家人物:姚思安和姚木兰。现代“庄子”姚思安的两大爱好是“道教精义和科学”,他超脱通达、无为而治。他是富商,拥有很多店铺,但并不亲自经营,而是委托给冯舅爷管理。对家里的事,也全遵照道家哲学,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并已觉十分满意。姚思安超脱世俗之外,沉潜于黄老之术的修养,赏玩古董,修身养性,视富贵如浮云。他在儿女成婚、妻子亡故之后,只身云游四方,长达十年之久。姚思安成了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另一理想人物是被称为“道家的女儿”的姚木兰,他受父亲的影响,认为“心浮气躁对心神有害”,遇事镇定,从不心浮气躁。当北京变乱,举家到故乡杭州去避难时,她冷静异常,从容准备,处变不惊,方寸泰然。“裂着大嘴微笑”的荪亚给木兰的印象不好,但她后来还是依父命与之结婚。她“相信个人的婚姻大事,是命里注定的”,从而放弃与之两情相悦的情人孔立夫。姚木兰是寄托林语堂道家思想的另一主要人物:“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5]797}

可见,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林语堂从生活方式、理论研究到创作实践等方面全面转向道家思想,这种全方位的转向在现代作家中是极为少见的。现代作家大多对老庄持批评态度,有的作家对老庄有好感,如郭沫若、周作人、闻一多、沈从文等,只是取道家思想的某一方面作为他们生活的调剂或创作的依据。相比而言,全面介入道家思想的林语堂可谓是道家的信徒了。

二、生存哲学:幽默、平和、和谐的哲学

林语堂对道家哲学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不是像鲁迅那样批判老庄造成中国人的巧滑、保守的国民性,也不是像郭沫若那样欣赏老庄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他选择了“生存”这一视角,探讨老庄思想应对现代西方世界生存困境的意义。他认为“一切中国的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认为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享受人生?谁最会享受人生?我们不追求十全十美的理想,我们不寻找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不要求知道那些不得而知的东西;我们只认识不完美的,会死的人类的本性。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要怎样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可以和平地工作着,旷达地忍耐着,幸福地生活着呢?”^{[4]78}这段话可以视为他对中国哲学的结论性意见。由他看来,中国哲学关注的最重要问题是生存问题,而不是西方空幻的形而上学,这正是他对中国哲学所持的立场。当然,林语堂的这个结论是由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共同观察而来的,但他在实际的论述中对道家的偏好是明显的,对儒家则颇有微词。

比如,他把庄子哲学看成是幽默的哲学,“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1]212}而幽默在他看来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方法或写作风格,而是“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6]51}他高度评价了庄子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逊色多少。”^{[6]51}生存论是林语堂关注幽默的根本所在。

对于老子哲学,林语堂则下了这样的评判:“这一部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6]102},“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的著作。”^{[6]39}他把老子哲学看作“阴谋”哲学、“俏皮”哲学,但同时认为,正是这种“刁慈的‘老猾’哲学却产生了和平、容忍、简朴和知足的崇高理想。”^{[4]85}因为这种“近情的微妙的智慧”,从而在中国产生一种“老猾的和平主义”。

林语堂对于庄子看重其“应付人生”的幽默,对于老子看重其和平思想,而不是他们思想严格的学理辨析,甚至忽略他们哲学的核心,这正是典型的生存论立场。

林语堂也认识到,道家哲学的本质是消极保守的,这对于人类是没有什么益处的:“道教的先知老子确是一位杰出教师,可是它那回复自然和拒绝进

步的本质对于解决现代人的问题不会有什么贡献。”^{[1]198}这时候他就借助了儒家的中庸哲学：“生活的最高类型终究应属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这种学说，就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4]92}但是，林语堂的所谓“中庸”与儒家的原教旨主义的“中庸”并不是一回事，孔子肯定中庸是一种美德，是伦理行为上的中间路线，所谓“过犹不及”^[6]。它是属于儒家伦理范畴；林语堂的“中庸”是指调和儒道后所得到的一种生活态度，“把道家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和起来，便成中庸的哲学。”^{[4]93}林语堂要用儒家的积极的生活态度来纠正道家的消极保守；而更重要的是，他要用道家的超脱来纠正儒家文明对人性的压抑。

林语堂认为，中国国民性的根本在于儒道的相反相成。“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对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基本不同的元素的锻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6]39}在他看来，道家的“冷淡”、“怀疑”、“对理想主义之不信心”的消极，与孔子“实验主义”的积极这两种相对立的人生态度共同作用于中国人，形成中国民族的特性。这种民族特性在于，“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6]40}在道家的“俏皮圆滑”、“怀疑主义”、“袖手旁观”的游戏态度中，中国人也就消解了儒家文明带来的严肃沉重，一种幽默闲适的人生从而产生。林语堂称这种民族特性是“永生不灭”的，这当中也暗示了他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于这种民族品性的看重。

林语堂是以儒道互补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国民性的。但是，尽管他认为“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6]51}但他并不是同等地看待儒道哲学对中国国民性所起的作用。他说：“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感情下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是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

服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6]101}林语堂虽肯定儒家的建设性，但他更注重人的天性，这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道家，而对儒家则在肯定当中包含了批判，他曾说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在辛苦地工作^{[4]116}，这可见他对作为中国人“工作姿态”的儒教的潜在的批判意识。又说：“中国人民出于天性的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7]其倾向性不言而喻。由老庄思想造成的闲适人生是林语堂思想的核心。

三、走向现代、面向世界

林语堂文学活动和学术活动最活跃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文明陷入战争的时期。战争宣告了西方科学物质文明的破产，传统的形而上学陷入危机。林语堂的生存哲学正是在西方社会面临最严重的生存问题时提出的，他力图用东方的古老智慧揭示出西方形而上学和物质文明的弊端，从而为世界的和平作出努力。他的批评不仅指向西方世界紧迫的战争和竞争发展等问题，更指向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

林语堂比较了中国哲学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简单讲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中国哲学家把一切的抽象理论撇开不谈，认为和生活问题不发生关系，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理智上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只把握人生，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地生活？’”“西洋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无聊的。西洋哲学以论理或逻辑为基点，着重研究知识方法的获得，以认识论为基点，提出知识可能性的问题，但最后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却忘记。”^{[4]127}这种分析是切中中西哲学的要害的：与中国哲学注重现实人生的特点不同，西方哲学发展了庞大的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在逻辑的无限推衍中忘记了生活，走向迷失。他针对这种迷失开出了药方：“人生真义这个问题，久为西洋哲学宗教家的悬案，中国人以只讲求实际的头脑，却解决得十分明畅。其答案就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及五伦的和睦。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或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这样淡朴的快乐，自中国人看来，不仅是代表含有诗意之片刻心境，乃为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得达此境，一切泰然。”^[8]简言之，实际的现实生活乃是治疗空想的良方。

事实上，林语堂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根本不感兴趣，他对西方哲学只是注重生存论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形而上的考察。正是这样，宣告“上帝已死”、主张大地的意义的反形而上学哲学家尼采引起了他的

的极大的兴趣,他主张:“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孕育万物的天地,必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必须有一种依恋之感。”^{[4]20}“现在已是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我们是动物’的适当时机。”“人类还受着原始时代的情欲所支配。”^{[4]52}这些观点是受到尼采“生活在大地上”、主张的人类的生物本能和反形而上种种思想的影响的。

林语堂称庄子是“中国的尼采”,而他着眼于尼采和庄子内在关联的基础仍然是生存。他虽然对尼采的大地、生物性、本能、情欲等概念津津乐道,但对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意志”、“超人”却只字不提。相反,林语堂是反对西方文化中那种过于强大的意志冲动的,而权力意志恰好是尼采哲学的核心。他对尼采哲学的根本趋向是警惕的,强大的意志冲动必造成和谐生活的破坏,这正是林语堂担心的。他反复强调,“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使身心协调起来。”^{[4]21}“哲学的结论和它的最高理想,即必须对自然完全理解,以及必须和自然和谐。”^{[4]19}其实,林语堂只是吸取尼采哲学中现实性的因素以建立切实的人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才将尼采与中国哲学同称之为“快乐哲学”。

当林语堂用这种哲学去观察西方文化带来的现实难题时,他显然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富有启示的思路。这种现实难题一是战争,一是社会领域里过度和竞争。关于战争,林语堂认为是西方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6]43}和“武力崇拜”造成的,而中国道家的理想即是一种典型的和平主义,这无疑是对西方人精神的良方。林语堂特别注意道家思想当中的和平因素,看出“老子刁慈‘老猾’哲学却产生了和平、容忍、简朴和知足的崇高理想。”^{[4]85}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以为“竞争是徒劳的。老子曰:智者‘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4]85}同样,庄子也用一个寓言讲述了“不争”的道理:有一种叫“意怠”的鸟,“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祸。”^{[4]88}

战争是西方社会激烈的竞争在军事领域的表现,这种竞争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就表现为对效率的追求和对事业的过度重视:“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及希望成功,似乎是美国的三个恶习。”^{[4]129}“人们为了生活而劳苦地工作,忧虑到头发发白,甚至忘掉游玩,真是不可思议的文明。”^{[4]119}为此,林语堂一针见血地指出:“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吾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6]43}正如西方哲学为了理念而忘记了

生活本身,西方人为了经济的繁荣、为了活下去而拼命忙碌,忘记了悠闲地生活。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人的生活观:中国人爱悠闲,“它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的态度。”^{[4]122}对资本主义世界激烈残酷的竞争现象,林语堂并没有表现出悲观,相反,他依据道家哲学理念大胆作出预测,认为西方人必定会改变态度,学习东方哲学的容忍精神,这种预测是有前瞻性的,无论是从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对道家哲学的亲睐还是二战后世界的相对和平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对道家哲学的阐释和现代转化,既是他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也是他本性的必然,同时是民族性格在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复活的表现;而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又为他的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契机。在20世纪上半期,国人重在反传统,全面学习西方,借用西方积极进取的哲学科学思想来“打掉古老文化的惰性与暮气”^[9],林语堂反其道而行之,看出西方哲学科学的流弊,而救之以道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他的理论放逐了形而上学,其生存主义有沦为实用主义的嫌疑;他的理论也有他在现实中失败的影子的投射,但是,他用生存主义来看待老庄哲学无疑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他用这一立场来看待西方文化,无疑把握了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某种症结。今天,当我们反思世界范围内汹涌的物质主义、竞争带来的人性异化及种族、信仰带来的民族冲突、战争等问题时,林语堂的思路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林语堂. 林语堂自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 [2] 朱艳丽. 幽默大师林语堂[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89
- [3] 林语堂. 谈女人[C]//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 17卷,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66
- [4] 林语堂. 生活的艺术[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5] 林如斯. 关于《瞬息京华》[C]//林语堂. 瞬息京华. 郁飞,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 [6] 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49
- [8] 林语堂. 林语堂散文(二)[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142
- [9] 胡适. 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556